

緒 論

文學社會學，顧名思義，是一門與文學和社會學都有關係的學科；但它並不是文學和社會學或文學理論和社會學理論單純的「結合」，也不是一門具邊緣性的學科。我們認為，在此，社會學指的是一個透視的角度、看問題的角度而非指事實真相；更確切地說，社會學被視為一種方法、一種探究方法、一道通路、一條途徑(*approche*)。因此，基本上，文學社會學是一些採取社會學的角度，運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探討、考察整體的文學現象的文學、美學批評理論和方法論。

在所有的文學現象中，社會都佔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地位。文學產生之先，社會早已存在，作家無可避免地要生活在社會裏，為社會所制約、限制、影響；作家總是努力反映它、解釋

它、表達它，甚至於設法改變它；社會也存在於文學之中，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看到它的存在、它的踪跡、它的描繪；社會更存在於文學之後，因為文學作品要有讀者、要被銷售、要被閱讀、要被接受。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是如此的密不可分，因而，自古以來，這種關係一直都是哲學家、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所深切關注、並致力探討和闡釋的問題。

文學反映社會？社會影響文學？文學有什麼樣的社會功能？社會的變遷又如何改變文學潮流？事實上，在文學社會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之前，思考文學——社會關係的概念、思想即已散見於古代中外的美學、哲學或文藝理論的著述中。《論語·陽貨》中孔子曾指出三百篇的社會功能；《毛詩·序》說明詩的感化、教育和改變風俗的功用，闡明詩與時代、政治以及文學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劉勰和鍾嶸亦分別在《文心雕龍》和《詩品》中闡述時代環境、自然環境和個人環境對文學所產生的影響；白居易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教育意義等；這一切正是文學社會學觀念的確立。在西方，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或古羅馬的荷拉斯都曾從哲學的觀點探討過文學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和文藝的社會功能等問題。文藝復興時期一些文藝理論家或藝術家如達文西等人則強調文藝反映現實的本質，和文藝的教育功能或娛樂功能。十七世紀的法國作家卜瓦洛(Nicolas Boileau 1636-1711)著的《詩學》(*L'Art poétique*)，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也是《百科全書》的主持人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寫的幾部《沙龍》(*les Salons*)多少都探究過文學藝術和社會的關係。

在法國，十八世紀以後，社會發展的步調加快，資產階級地位上升，社會生活型態的改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日漸發展進步，在在都促使文學批評家、文藝理論家、美學家更注意文學——社會的關係。文學創作的日益豐富，作品產量和作家人數的增加，作品內容隨時代社會而呈現的多樣化，尤以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震撼和社會改革更是有利於文學社會研究的進展。

然而，在十九世紀以前，雖然已有許多文學家和文評家——無論中、西——都意識到時代、社會和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也極力想加以解釋，却大部份只能提出一些片斷的、沒有理論基礎的看法，未能對這種關係加上社會學的解釋。第一位將文學——社會關係視為一嚴肅課題並應用有系統的方法加以研究的，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法國女作家斯達勒夫人(Mme de Staël)。她於一八〇〇年出版的《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論文學》(*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簡稱《文學論》)中，鄭重地指出文學和社會的互動關係，並提出科學的研究方法。這部劃時代的專著標誌了文學社會學的誕生，開啓了不單是法國、也是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一個新角度和新方向。

自斯達勒夫人而後，尤其是在法國社會學始祖孔德開創了社會學以後，許多文學批評家把文學活動視為社會活動的一種，置之於整個社會活動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分析，闡明文學現象在整體的社會活動中的特質和地位，解釋文學與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等活動的互動關

係。文學社會學的理论漸漸地以較有系統的體系方式出現。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文學社會學研究更是日受重視，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文藝批評家、美學家紛紛以各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學說理論和方法加入研究的行列，拓展了這原本就已錯綜複雜的研究領域。

在社會和科技的發展節奏都日益加快的今天，我們認為研究文學社會學是有其必要性的。社會結構的轉型深深地影響到今日整體的文學現象，而文學也在反映現實之際以某種程度的力量不斷地改變社會。一種文學潮流或運動為何只在某種社會結構或型態下才會產生？在整個文學現象中，個人、社會團體、社會階級、社會制度以及個人意識和集體意識都扮演什麼角色？作家為何要寫作？寫給誰？寫什麼？什麼時候最需要創作？他表達的又是什麼？文學作品完成後，要透過什麼途徑到達讀者手裏？什麼樣的讀者閱讀什麼樣的作品？讀者的心理是什麼樣子？在傳達的過程當中，作者、發行者、出版社、書商、讀者又各佔什麼樣的地位？傳達的訊息是否絲毫無誤地全被接收？這中間可能發生的變化又是什麼樣的情形？差距可能有多大？接收到的訊息又可能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和影響？還有其他種種文學和社會之間可能會發生的複雜關係都是文學社會學研究的範圍和課題。

本文是我們有關文學社會學研究系列的重要部份。我們認為研究文學社會學的緣起及各重要文評家的理論、方法應是最基本的第一步。除了從而了解到文學社會學的起源和發展外，我們也藉此深入地分析每一理論的形成、發展、貢獻和影響，並指出其中的優、缺點加以評

判。唯有如此，才能在將這些理論應用到中國或西方文學作品批評的實踐上時，不致於出現誤解、錯用，或因強硬套用而產生的不合適現象。

本文可分為三大部份：

第一部份包括第一、二和第三章，是文學社會學的起源階段。

第二部份包括第四和第五章，是文學社會學的發展時期。

第三部份：第六章，則是以發展階段中的西方理論之一——高德曼的理論——應用到中國文學上的實踐。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們選擇了斯達勒夫人、鄧納、郎松、艾斯噶比和高德曼五人的理論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這五位在文學社會學研究上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都是每一不同時期的代表性理論家：斯達勒夫人是文學社會學的奠基始祖；鄧納是實踐主義興起之後唯科學潮流下的文學批評者；郎松則在十九、二十世紀交界之際創設了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文學史方法。他們三人的研究論著中，雖已有很明確的文學社會關係概念，而且各以不同的方法、角度去解釋這關係，但我們認為他們仍屬起源時期，是因為文學社會學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時還只是一個雛型，處於起步階段，而尚未有正式的名稱。艾斯噶比在五〇年代末出版了《文學社會學》一書以後，這類文學批評研究才被稱為「文學社會學」。艾斯噶比的實證社會學方法標誌另一個新里程碑，研究的對象、關注的課題與以往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高

德曼的「發生論結構主義」則以哲學思辨的基礎分析和闡釋文學作品的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對應關係，「起源」的概念雖也會在其他研究者的著述中出現，但以認識論和辯證論的學說作為出發點來考察文化創作、文學活動與社會結構的起源及其對應關係則以高氏為第一人。

雖然五人的重要性一致，但起源部份所佔的篇幅比發展部份小很多，主要原因是因為前三人或屬萌芽時期，或屬剛起步時期，理論架構尚未發展到很繁複的程度；此外，我們能掌握的十九世紀的文獻和資料也較二十世紀的少。我們認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啓迪作用，他們的的主要概念或精神留傳下來的深遠影響才是文學社會學的骨幹。至於艾斯噶比的著述和他的有關資料的確很多，但我們認為他的研究大多以實證社會學方法完成，這些社會調查、統計技術的特點是科學性偏重，而理論思辨的層次則不足，因此，第四章所佔的比例雖較前三章多，與第五章相比似乎又嫌少了些。我們之所以將大部份的篇幅留在第五章，不僅是因為蒐集到的高德曼著作和有關的資料非常豐富，同時還因為高德曼創設制訂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他的許多重要研究都是他自己理論和方法的實踐。由於這套理論體系牽涉的層面廣而多，層次錯綜複雜，重疊交叉，它涉及哲學、文學、美學、藝術，甚至於整體的文化現象，要詳盡和精確地闡釋、分析及批評如此完整的一套理論和方法，我們需要的篇幅不可避免的便相對地增加許多。

至於第三部份的第六章，是我們在分析了高德曼的理論之後，認為他理論中的一部份可

以應用到中國文學的研究上而做的嘗試。我們借用了高氏理論中探討文學作品內的意涵結構（闡釋作品的具涵義結構）及世界觀的方法，來剖析東坡詞的世界觀。我們之所以選擇東坡詞——詞是一種一般人認為不大可能做文學社會學研究的文類——來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基於東坡詞所具備的各種條件，恰好符合高氏理論中有關這一部份的要求：高氏特別強調社會生活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而蘇軾波折起伏的一生與其所處的時代、社會有極密切的關聯，必然無可避免地影響到蘇軾的創作；其次，東坡詞屬文學類作品，是感性的精神結構、非概念性，蘇軾又是中國文學史上公認的偉大作家，其詞作也是受到肯定的偉大文學作品；而最重要的一點，是高氏理論中的「世界觀」論點，他認為越是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其「世界觀」也必然越緊密連貫。高氏理論原為分析小說而建立，一部小說的世界觀當然較易統一連貫，也遠比表達在詩、詞中的世界觀更易剖析；而蘇軾雖然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社會環境、遭受不同的際遇時創作，仍然能在其詞中呈現完整一致的世界觀，這種特殊的情形甚至已超越了高氏理論的要求。

我們這個實踐只是一種試探，企圖在文學批評的領域中尋找一個新的角度和觀點。基本上，我們認為每一種理論或方法都有其優點和缺陷，因為它們之所以會出現都有其不得不產生的時代、文化和社會背景，就跟所有的文學現象一樣。因此，甲理論適用的時代和文化並不一定適用於乙理論，而甲文化背景適用的理論也不一定適用於乙文化背景；但是，文學一

如文學批評，因其特殊性質而會使東、西方文化——即使受制於時、空巨大的距離之下——在某些地方仍具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我們的研究就是建構在這種世界文化的共通性之上。另一點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在以西方理論應用到中國文學研究上，或反過來，以中國理論剖析西方文學時，絕沒有優劣之分或以甲文化壟斷乙文化的意思。每種文化體系都有其優點、缺點，每種文學理論都各有利弊，有其能到與不能到之處。我們的目的在於從不同的美學體系中，吸收其優點，試圖在不分東、西的世界文學批評領域內，開拓更新的視野。